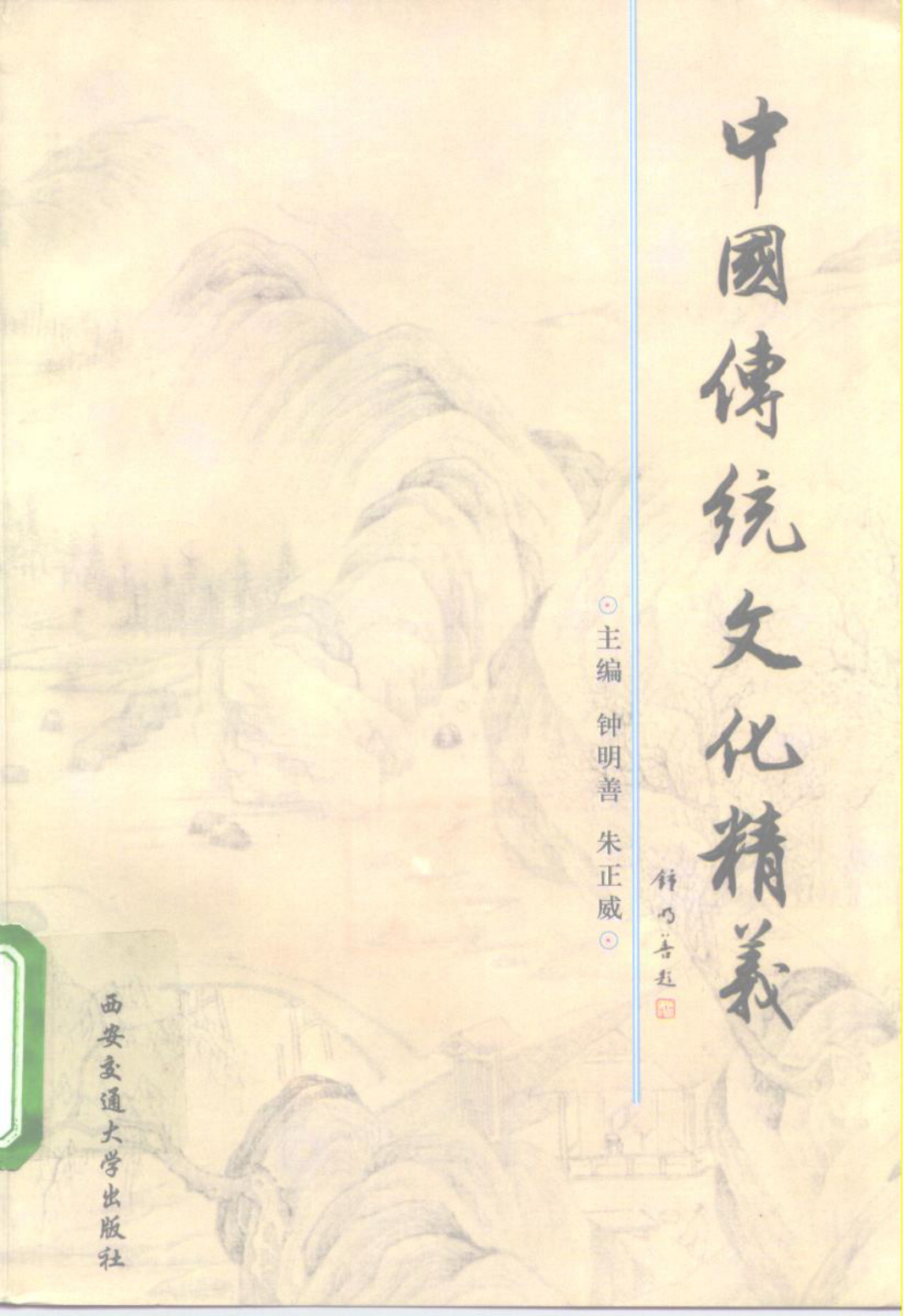




# 中國傳統文化精義

鍾明善題

主編 鍾明善 朱正威

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

# 中国传统文化精义

主编 钟明善 朱正威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 内容提要

过去是未来的钥匙。创造性地承继华夏先祖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从五千年华夏文明中汲取有益的智慧,是本书写作的宗旨。

《易传》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书稿作者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入手,以或冷静、或深沉、或热烈、或隽永的笔触,构画出儒道佛的精髓,传统哲学的智慧,政治文化的睿智,伦理道德的凝重,文学艺术的精粹,古典美学的魅力,科学技术的辉煌,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理性审视和未来展望,从多角度、多层面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景观和无穷魅力。独特的视角,新颖的体例,深邃的思考、洗练的文笔,令人耳目一新,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本书适合大中专院校学生和社会各界关注、热爱中国文化的广大读者阅读、欣赏,也可作为高校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教材。

## (陕)新登字 007 号

### 中国传统文化精义

主 编 钟明善 朱正威

责任编辑 李 勤

\*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咸宁西路 28 号 邮政编码:710049 电话:(029)3268316)

西安向阳印刷厂印装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 mm×1 168 mm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7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 001~11 000

ISBN 7-5605-0941-X/G·90 定价: 13.80 元

---

若发现本社图书有倒页、白页、少页及影响阅读的质量问题,请去当地销售部门调换或与我社发行科联系调换。发行科电话:(029)3268357,3267874

#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

## 序《中国传统文化精义》

肖云儒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集体撰写,钟明善、朱正威先生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精义》,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为绪论,其他各章按四大板块分类组合——一、三足鼎立的儒道释文化;二、哲学、伦理、政治文化;三、美学与文学艺术文化;四、科学技术文化;从各个方面、各个层次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特色,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和各部分与总体的关系,最后归结到世界格局中的中国文化和新世纪中国文化展望,结构清晰,自成体系,论述简明准确,有些地方有相当的深度,是一部大学生和同等学历水平的社会读者全面了解中国文化精神和传统文化内容的好书。

翻检这部书稿,有二点印象颇深。一是史论结合。各个主要章节都以一定篇幅介绍了中国文化某一部分历史发展的脉络,在史的基础上,或夹叙夹议,或专节专段展开理论的分析 and 阐述。史的介绍不求丰富但简明准确,有一定的知识性和可读性;论的展开既重创见又严谨清晰,有一定的思考启动力。史论结合,虚实相生,普及与提高并重,对读者增长知识和拓宽视野大有裨益。二是传承与革新结合。对传统文化资料的介绍,大体能遵循信、达、雅的原则,而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分析,在许多章节中却又体现出对当代先进社会科学营养和成果的汲取,体现出新的立论视角和辩证思维。这都有利于当代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在阅读中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精神。

蒙编撰者邀我为此书作序,寻常的大路话就不多说了,倒是想借书前的一方宝地,谈谈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在活力的一些思考。这些想法已经形成多年,也在交大人文学院和别的一些场合讲过,

由于一直没有形诸文字,也就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交大人文学院的同志给了我这个机会,倒是要感谢他们。这些想法很不成熟,在运用充实的资料作详实论证上,更是不足。姑且写出来,就教于西安交大人文学院的学者们,就教于年轻的读者们,以便于有机会作更进一步的整理、扩充、深化。

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得更宽泛些,中国民族文化,是僵滞、封闭的超稳态结构,还是具有内在活力的多维动态结构,是近年来文化研究中争论的一个焦点。由于涉及到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看法,这一争论超出了学术文化界,引起了普遍的社会关注,产生了深广的社会影响。超稳态结构论者,对中国文化持一种全盘封闭的观点,必然引出彻底抛弃民族文化传统,走全盘西化道路的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盘封闭论实际上是全盘西化论的理论基础。

任何一种具体的民族文化,就其文化因素在功能和传播上的特征而言,都有三个层面。即适应性层面,指那些对人适应环境与自身需要有直接功用的文化因素;归属性层面,指用来表示文化主体是属于哪一个人群的那些文化因素,这一类文化因素在其本义上是传播的;审美性层面,这里审美是泛指人们独创的、用以表现个性的创造性活动,不仅包括文艺,也包括各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创造性活动,因而审美性文化因素具有扩张自己人群性背景的趋势。这三个层面的文化因素常常是交叉地体现在具体的文化门类中。习俗、娱乐社交、伦理,常常同时体现适应性、归属性层面的文化因素;艺术文学常常同时体现审美性与归属性层面的文化因素;技术、科学、历史感则常常体现出三个层面的文化因素。应该承认,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局限,在于过分夸大适应性与归属性层面,所以表现出沉滞、封闭的一面。但是深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考查,审美层次的创造活力是强大的、不容忽视的。

在前些年的讨论中,不少人常常就文化传统既在性内容来谈中国文化的优劣,这当然是对的。因为中国文化既在性内容中容纳着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继承、发展精华,淘汰、扬弃糟粕,是民

族文化具有活力的重要表现,是中国文化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但仅仅在这个范围内来讨论问题还不够,眼光应该向更开阔、更纵深的层面拓展。

我们的民族文化从内在结构看,其实是稳态和动态两种传统精神的对立统一。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华民族的许多精神素质、文化结晶,包括团结凝聚、自信自强、艰苦奋斗和奋发进取的民族精神,包括天人合一、家国同构和伦理中心的传统文化特色,包括种种政治、法律、伦理、科学、学术、艺术成果和集体无意识心理,构成我们民族相对静止的、稳态的精神传统。所以说这种稳态是相对的,是因为它们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运动中不断创造、积累而成的,而且还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也是因为它们并不是单面的、纯一的,而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一个多维复合体。这个多维复合体的各部分、各层次,这个大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之间,构成许多对立统一关系,处在不停的矛盾运动之中。这是一方面,我们可以称为民族文化既在性结构。它具有时间、空间双重多维复合特色。

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民族文化过程性结构的开放溶汇特色。中国文化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地汲取各方面新的文化因子,经过汰选、改造、溶汇,化为自己的血肉生命,使中国文化能以周期性的更新、发展、进步。这是历时地看。共时地看,它总是以本位文化为核心,多方溶汇多种文化因子,作为一个开放的复合体存在着。以对异质文化的开放、溶汇来促进本位文化的开拓、发展,是一种多维开放的动态结构。这构成了中国文化内部又一个矛盾过程。

只有将民族文化传统作为一个在历史进程中活生生的运行机制,在多层的联系和矛盾运动中研究它在发展中的优势和内在活力,才能窥见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地绵延、发展、壮大的秘密,从而在更深广的意义上继承、发扬民族传统,使之转化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力量。

## (一)

民族文化的既在性内容,是指这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活动中创造、积淀下来的文化遗存。中国文化既在内容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多维复合结构。有人形象地将它比喻为一条粗大的电缆,里面拧合着许许多多电线,共同担负传递中国文化各方面信息的重任。

中国文化的发端是多源流的。愈来愈多的发掘考证表明,中华文化不是一线单传,而是东西南北中多源流汇聚而成的。既有北京周口店人,也有广东马坝人,湖北的长阳人,山西的丁村人;既有西安的半坡文化,也有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遍布祖国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华南和西南地区、北方地区、青藏地区的上百个文化遗址,足以证明中国文化发端的多源说。

中国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组合,是汉、蒙、回、藏、维吾尔、苗、满、朝鲜等 50 多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千百年来,回纥文化、吐蕃文化、蒙古文化、南诏文化、辽金文化一直和汉文化多维共存,在交流互补中竞相发展,构成统一的中国文化的多维有机整体。从公元前 5000 年的远古时期开始,中原彩陶文化就陆续西传至新疆伊犁河流域和阆、皮山一带。在商周时期,中原华夏文化和西北部的草原文化就有了早期的接触,这种接触后来发展为日益深广的交流,一直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绵延下来,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交流、溶汇的一个重要特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西部和北部的兄弟民族文化大多为游牧文化,和汉族地区的农耕文化形成鲜明的反差,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一翼。其中对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两点贡献,我以为一是游牧民族在世代移畜就草生存方式基础上形成的动态生存观和竞争、选择意识,以及相应的价值观、道德观、思考方式。这对于汉族农业文化区在历代守土为业生存状态基础上形成的静态生存观

和相应的文化心理是重要的补充,它给中华民族稳态心理圈中注入了动态的、竞争的活力。二是这些兄弟民族文化作为汉文化和世界一些主要文明区的通道,不但通过丝绸之路、唐蕃古道、草原之路以及贯通陕、川、滇、缅的南方丝绸之路引进了大量的波斯文化、地中海文化、印度文化,而且在这一文化传播过程中使中华文化 and 外来文化得到了初步的溶合,为建设发展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它是民族文化结构多维性和开放性的重要成因,使中国文化受用不尽。

就汉文化内部来说,又是多地域、多流派的。既有先秦时期的秦蜀、三晋、燕齐、邹鲁、吴越、荆楚等地域文化的多板块组合,又有其后的儒、道、墨、法、兵、民、农、阴阳的多流派、多学派竞荣。后来虽然由于政治上秦、汉、隋、唐的大统一,多维的地域文化和流派文化也在交溶发展中逐渐趋同,儒学以官学的形态授受于庠序、流布于民间,形成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格局,但原先的多维性却潜藏下来,形成文化统一体中的隐形结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以儒为核心,儒道释为主干,溶合各种文化成分的多维文化复合体。

中国民族文化的多维性还表现在其他各个层面上。我们上面讲到的大多是主体文化结构层面上的多维性。其实,次生文化结构层面的多维性更为丰富。文化的次生林带常常处在若干主体文化圈的交汇地带。既在各圈之外,各圈又在其中。比如江、河、淮、汉四个文化流域中,江文化,即长江文化流域,以道铸魂,以水表意,以骚寄情,覆盖着整个南中国;河文化,即黄河文化流域,则以儒铸魂,以山表意,以诗寄情,覆盖着整个北中国;江河文化构成民族文化的主体结构层。而处于江、河文化衔接、过渡地带的淮河、汉水文化流域,大致属于民族文化的次生林带,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多维特色。汉水中上游,是秦陇、巴蜀、荆楚文化的多维交汇区。陕甘宁边区、祁连山腹地和川滇西部则是中原汉族农耕文化和西部兄弟民族游牧文化两大主体文化圈的衔接、过渡地带,都表现出明显的多维交汇特色。在宫廷文化、庙堂文化、贤哲文化和民间文

化各层次中,庙堂文化因宗教的多样,贤哲文化因流派的多样,都显示出一定程序的多维特色。在宫廷文化、庙堂文化、贤哲文化和民间文化各层次中,庙堂文化因宗教的多样,贤哲文化因流派的多样,都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多维特色。民间文化溶汇在最具活力的群众日常生活之中,更是异彩纷呈。

传统文化既然是这么丰富的一个多维复合体,我们也就不能从单一的坐标出发来评断整个传统文化的优劣。比如,认为中华文化世代相沿的主要形态是“礼”,礼治维护三纲五常,使人的个性、主体性消融在贵贱有差、尊卑有等的等级隶属关系之中,形成了“主奴根性”的卑劣品格。这样分析“礼”的消极方面并非没有道理,但却没有看到“礼”在特定历史时空范围内相对积极的方面——“礼”也增进了人与人,人与家,人与国强韧的亲合力,这正是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的一个历史原因,是我们民族传统爱国主义的一个基础。更没有看到,“礼”只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一个方面,还不是全部。因而用对“礼”的否定来贬抑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就不那么科学了。

在对民族文化复合体的分析中,最主要、最本质的是从思想和文化性质上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是以文化是否具有人民性为其标准的。列宁提出过“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的著名论断,实质上是以人民性为标准对民族文化中不同思想政治倾向的文化成分进行分析。他指出要和反动的、落后的民族文化糟粕作斗争,并在这种斗争中“全力抓住、利用和巩固”同进步、健康的,亦即具有人民性的文化精华交流和联系,深刻地揭示了民族文化内部最深刻的矛盾运动。毛泽东对文化的人民性也作过明确、完整的解释。他说:“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3卷826页)毛泽东把一定文化对待人民的态度和历史上的进步意义统一起来,使我们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倾向性分析时有了科学的标准。凡是直接间接

表达了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符合人民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归根结底有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历史前进的文化，都是具有人民性的文化。由于人民和统治阶级都是一个历史范畴；知识分子在思想倾向上又常常具体归属于人民或统治阶级；人民的文化和统治阶级的文化处在民族文化的矛盾统一体内，又斗争又同一，相互影响、渗透、制约，等等这样一些复杂情况，“两种民族文化”在具体表现形态上是复杂的、多维的、色彩斑斓的。民间文化中常常夹杂着这样那样落后、愚昧的糟粕，统治阶级文化在特定情况下也会具有某种人民性的因素。当统治阶级作为新兴革命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他们的文化常常代表了新生产力的要求，有利于历史的进步；当遭到外族侵扰时，统治阶级内部某些集团或个人抵御入侵、保卫民族共同利益，在客观上与人民的愿望相一致；当统治阶级走向没落，内部也常常分化出一些叛逆者或浪子，尽管原因很复杂，却会在不同程度上传达人民的要求，甚至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因此，统治阶级文化中往往交叉呈现着这样那样具有人民性文化的因素，对此我们要作历史的、辩证的分析。

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多维复合体的中国文化在思想倾向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人民性的文化历来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从总体上构成了我们民族优秀的精神传统。许多文章都详尽地、系统地列举了这方面的论据，我只想介绍其中关于古代神话、寓言的几个例子。因为神话是“最初一些民族的文明史”（维柯：《新科学》，352页），是民族精神最早的浪漫主义体现。而“任何民族的历史都肇始于寓言”（同上）。神话和寓言常常以隐喻、象征的方式传达出一个民族对现实世界形而上的反应和感悟，从而透露出民族的深层精神气质和理想。

外国的创世神话，比较普遍的是上帝选人、选物说，而中国的创世神话则是盘古用斧头开天辟地创造了世界。这个开拓神的形象，体现了我们民族认为人是天地之母、宇宙之主的英雄气概。女娲补天的神话，说明天并不是完美无缺，要靠人用地上的石头来

补。羿射九日,手下留情才保留了最后一个太阳——中国人民征服自然中有何等的英雄气概。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等神话,是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天仙配、牛郎织女则是穷苦的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在我们民族的宗教文化中,民间神祇多数是为社会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的英雄或道德楷模,如孔圣人、药王、鲁班、杨家将、岳飞、屈原、武侯、关公、包公等等行业神与人格神。民间传说中的鬼也不完全是恶的象征,有许多是死不瞑目的反抗者、幸福和理想的追求者。我们从这些民族的精神原型中,可以窥见内化于其中的中华民族精神优秀、美好的一面是如何处于主导方面了。

## (二)

中国民族文化演进的运动规律是什么呢?从发掘它内在活力的角度,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一条动律,是在主体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汲取内外多维文化的营养,在开放溶汇中发展。即以本位文化为基础,大量汲取、溶汇异质文化的精华,以对异质文化的开放,促进本位文化的开拓。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文化是一种多维开放的动态结构。

中国原始哲学其实是将运动变化作为自己认识的基础的。有人谈到,“易”即是“变动”与“不动”,“周”则是“周行”与“周期”。“周易”的本质含义即是“运动的规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也是以运动与开放为特征的人本哲学。在远古的自然科学中,“五行”即是讲“五种基本原素”的运行法则。中国人按动物的飞、走、爬、游的运动方式来将它们分成鸟、兽、虫、鱼的类别。(参见陈绶祥《漫谈中华文化的开放性特征》,载《自学》1989年第12期。)任继愈先生谈到过这样的观点:“融合是民族文化发展的规律”,“文化发展,是不同地区的文化,不同民族的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分化的过程。停滞不动的文化,既不融合也

不分化的文化,是考古的对象,不是活着的文化。”(《民族文化形成的特点》,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辑)在中国和外国,凡融合交汇色彩强烈的文化,凡重视文化交汇,对文化交汇能因势利导的民族,常常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从而构成世界文化总格局中生机盎然的一元。

中国民族文化演进动律的开放、溶汇特色,是中国文化能以罕有的活力自立于世界优秀民族文化之林的重要原因。

也许可以说,我国古代原始认知方式的独特性就为后来的开放溶汇动律埋伏了最早的基因。正如有人分析的,这种认知方式不重视数量、质地所显示的性状的实证分析,而重视感觉模式造就的直觉把握;不重视概念的精确所造成的事物质的界线,而重视关系的总体协调与统一;不重视事物的发展、概念演绎的逻辑规律,而重视从文化感受和实践经验中得到的印象和概率;不重形体、数量之间的物理关系的剖别、破坏与改造,而重视状态、过程在自然、人际之中心理与创化关系的判定、控制和平衡。这种认知思维的混沌性认识、文史性理念、中庸性方式、关系性本源等哲学特征,正是开放文化体系所要求的模糊性与相对性的前提。

中国文化在关于“本源”的原始“二气”说中,不但确立了相对与相抱、相离与相即、相斥与相合的初衷;同时要在“二”中加上“运动”这个第“三”元素。才能“三生万物”,才能在运动中产生新质的事物。这和辩证唯物主义在主张内因决定论的同时,重视外因的作用,强调外因是事物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强调要主动地发挥外部条件的作用,积极地将外因转化为内部动力的理论,和现代哲学中关于导入、借助新阶范畴——“第三范畴”(即“三”)推动、促发矛盾对立面(即“二”)在斗争中转化为新事物的理论,是多么相通、相似。这实际上以朴素辩证法的形态反映出关于事物在开放、溶汇中发展的观念。中国文化在关于“本体”的原始“五行”说中,不但肯定了相克与相成、相辅与相抑、相生与相灭的关系,同时还要在这个“五”中突出“中”这个人文与社会的自我把握,才能使世界成

为运行中完善的“六合”。它们在关于本质的原始“八卦”说中,不但提出有与无、知与行、动与静、序与乱的原则,同时还要在这个“八”中注入对无穷时空与无穷认识的演排,才能使“九九”世界“归一”到“人类”自身。

因而,它的开放性表现在对构成这个体系的所有元素之既独立而又不孤立,既肯定而又无所不包的要求中,存在于那种所谓的“一粒米藏着大千世界”之理念认识里,而不是表现在某一局部的稳恒与限制等“科学”计算中。它的开放性还表现在对体系构架既单纯而又不单一,既规则而又捉摸不定的要求中,存在于所谓的“了而未了”的本质关系所决定的“大道无极”这总体包容性上,而不是表现在某一局部的进取性上。它对任何新的对象都要经过反复的“文”而“化”之的过程(即外部实体元素化的过程),都要在实体对象变成某种文化观念(即体系内元素符号化过程)之后,才又以原有的文化模式接受下来(即体系无序耗散之开放发展过程)。这些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特征鲜明地体现出无序而耗散构架的开放本质。中国的“字”与“词”作为基本的视听符号元件,都具有不变与万变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它们有开放体系中元件最本质的独立特征:可在任何构架中保持自身的恒定模式与最牢固的自体结构,不像西方文字有性、数、格的变化。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开放体系中构架最广泛的结构与最强大的结体功能。“车”字,既可组合成“汽车”、“纺车”、“风车”,构成一重含义,又可组合成“车转身来”,构成另一重含义。“打”字,既可以组合成“打人”、“打狗”又可组合成“打酱油”、“打酒”、“打主意”、“打算”和“一打”,构成多种不同含义。这种“测不准”性,正是中国文化体系开放特征的表现。

事实证明,中国文化在它的发展长河中,是在开放性、兼容性和封闭性、排它性的对立统一中前进的。而且开放性、兼容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早在七八千年以前,西藏的旧石器、新石器文化就对南亚次大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西藏的细石器进入到印度东北部,达于恒

河中下游,对印度这一时期非几何细石器以重要影响。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中,中国文化发展的三次高峰,即汉代、宋代与现代,都和文化的开放交汇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先秦诸子百家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第一批建造者,大都能以开放的思维体系,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对传统文化加以更新、发展。孔子虽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实他所谓的“述”,并不是泥古之述,而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对古代的文化典籍来作阐释,是在“相因”(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损益”(增删、抉择)。从当代释义学观点来看,这本身就是一种改造、创新的形式。正因为如此,春秋时代才能出现这么多新的思想理论观点,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那个时代儒家的道德意识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道家的个性意识和艺术人生观,墨家的“兼爱”思想和积极救世精神,法家的社会进步思想和法制精神,等等,莫不是溶汇了当时社会各个政治集团和社会思潮不同的现实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后来又经过秦汉之际董仲舒等思想家对各家学说的溶汇贯通、创造性综合,才奠定了代表封建大一统专制社会体制的秦汉文化。这个文化后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石之一。

那以后,汉魏隋唐以至宋明,中国文化对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进行了上千年的吸收、改造、融合,终于将佛教整合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形成了中国佛教自身极富生命力的文化复合体。近于《中庸》的天台宗、近于《周易》的华严宗、近于《孟子》的禅宗等中国化佛教相继创立,儒道释三位一体成为中华文化的支柱。同时,采纳了佛学内容的儒学——宋明理学也因此产生、壮大。可以说,佛教文化的导入和融汇,对于代表中国封建社会转变时期哲学和思想解放的魏晋文化,对于代表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高峰和中外文化交流融汇的隋唐文化的形成,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不但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对世界佛教文化和整个世界文化也作出了贡献。而耐人寻味的是,不注意交融,过分强调外来文化“原版性”的佛教流派,如唐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创立的一味追逐“天

竺化”(印度化)的法相唯识宗,由于没有整合进中华文化体系之中,却成为中国佛教宗派中短命的一支。(注:参见刘修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承接、扬弃和开拓》,载《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1期)

明清之际外域传教士东来,马可波罗以一部《世界见闻录》对中国的东方文明特别是风土人情作了详细的展现,令欧洲人惊叹不已。随后郑和下西洋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使中国的四大发明、瓷器、玻璃工艺和航海技术在世界得到展示和流布。十五世纪的意大利画家达·文西曾以中国画的笔意描绘托斯卡景色,十七世纪明代工匠曾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专门设计烧制青花盖碗。利马窦、汤若望、熊三拔、南怀仁等欧洲人将西方的科学技术、生物医学和文学艺术介绍到中国,影响和造就了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代科技人才,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封建社会的衰败期,特别是近代社会东西方文化碰撞对封建体制的存在产生威胁的历史时期,怯弱的封建统治者用封闭的手段排斥先进的外来思想和文化。但就在这个时候,整个民族文化的开放机制也还在起作用,甚至如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反倒激发出渴望开放、渴望在文化溶汇中前进的强烈社会需求。

这也许正是近百年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去寻求真理,以构筑新的思想体系,救国救民、振兴国家民族的一个原因。康有为宣称他的学说是参合中西哲理、穷究天人之变的产物;孙中山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术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见《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0页)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给自己提出的学习原则是:“庄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这不是无批判的兼收并蓄,而是要“挹其瑰宝”,“绝其缁磷”,以达到“取精用宏,根茂实盛。”二十世纪初,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陈独秀等思想文化先驱者,发动和领导了“五四运动”,掀起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涌现出以毛泽

东、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思想家、革命家。在中国社会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指导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胜利,这一胜利的历史进程揭示了本土文化成功地融合外来文化的一般规律。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民族文化的渊源,可以从理论的独创性、历史的继承性和形式的民族性几方面去思考。

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的独创性,主要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并具体解决中国现代革命和建设一系列问题的结果。同时,也是他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革命实践为基础,溶汇、汲取中国民族文化精华和民族革命传统的结果。毛泽东特别重视以民族历史斗争的经验为借鉴,以历代论著的精华为资料,来探讨和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的战略与策略、路线与政策。而且常常以我们民族特有的表现形式,来表达和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使之具有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在政治思想方面,毛泽东把古代关于“仁政”与“刑政”、“礼治”与“法治”的思想紧密结合起来,批判地吸收了儒、法两家的合理因素,特别是吸收了荀子把二者统一起来的思想,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加以改造,用以阐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治国”理论。在“用人”上,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尚贤”、“任能”的思想极表赞赏。他指出: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的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是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并且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贤”的标准,对这一古老命题作了根本的改造与发展。

在军事思想方面,他在对古代著名战例研究的基础上,对孙子等古代军事家提出的一些正确的作战原则加以改造和发展,使之

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的组成部分,如由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提出重视调查研究,重视敌我双方情况的对比;由吴起的“一可去十”、司马迁的“以一当十”提出战略上的“以一当十”,战术上的“以十当一”;对孙子的“避其锐气,去其惰归”、“以逸待劳”,项羽的“先发制人”进行改造,提出“后发制人”、“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至于对中国历代农民战争经验教训的分析总结,更是闻名于世。

在经济思想方面,民主革命时期,他重视借鉴历代农民起义的“均平”、“均田”思想传统,坚持把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多次号召向中国历代的改革和探索者学习,去掉保守,解放思想,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毛泽东的文化、哲学思想,是对历史文化遗产学习得较多、成绩也较大的领域。比如他对中国古代所谓“法先王”与“法后王”的争论作出历史结论,提出“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作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根据春秋战国时期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历史经验,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认识论上,对中国古代在知与行相互关系上的各种观点进行综合的研究和辩证的思考,得出新的结论,用来阐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在辩证法方面,把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的朴素辩证思想加以批判地吸收和正确地发挥,用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原理。而作为认识论和辩证法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更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贡献。可以说,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性优势,以中国革命实践为土壤,溶汇中国和世界优秀文化的成果。

在中国现代革命历程中,有三次思想解放高潮,即五四运动时期、延安整风时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三个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文化思想最为活跃、最有成果的时期,也正是中国文化最为开放,最为重视交汇,而且利用、发挥、伸延文化交流成果最好的时